

税率、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基于当前财政政策的理论及模拟分析

□ 李东松 赵志君

内容提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降一补”任务已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把税率看作生产与消费的约束条件,考虑公共服务支出对消费的外部性影响,将消费税率、劳动税率和资本收益税率以及政府转移性支付等公共服务支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从而构建一个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税率与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变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在独立可加与非独立可加两种效用偏好假定下进行理论推导,并以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产出比率数据为基准值进行数值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产出与各税率均负相关;(2)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消费函数中所占份额的关系则因税种、效用偏好不同而存在差异。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偏好 税率 公共服务支出 产出

作者李东松,博士,河北经贸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讲师;(石家庄 050000) 赵志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财经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36)

DOI:10.14167/j.zjss.2019.03.002

一、引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至今,我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在“一降一补”两大经济任务方面,范围之广、力度之巨,已有目共睹。在降成本方面,调整小微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率;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扣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以及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在补短板方面,加大教育、社保等基本民生支出,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工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的公共性、普惠性,加大对三大攻坚战的支持。具体体现是,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约8000多亿元;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

成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约280万人;深入推进产业、教育、健康、生态扶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等。201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要更大规模地减税、更加明显地降费。由此可见,降成本、补短板的经济举措在当前的财政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

税率、公共服务支出政策的经济影响一直为学界所密切关注,而经济体产出的变动可以通过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因而,有关税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体产出影响的文献也可以从其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为视角进行梳理。Barro(1990)首先将公共服务支出作为生产要素与私人资本一起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研究,其公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中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研究”(项目编号:71263050);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

共服务支出源于实行平滑税率的收益税,生产函数则关于两种生产要素规模报酬不变。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均与生产性政府支出-产出比之间呈倒“U”形关系。该模型的设定虽然较为简单,但却为研究公共支出、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税收政策主要通过税率来体现,不同的税率会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异样的影响。譬如,就小国经济来说,如果允许资本流动,那么税收政策往往导致经济呈现两种态势:跌入停滞、甚至衰退的“发展陷阱”,抑或步入迅速扩张的“增长奇迹”轨道(King & Rebelo,2004)。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与公共服务支出所形成的公共物品的性质有关系。如果将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看作私人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并假定其具有非排他性以及不同程度非竞争性,那么能够证明,最优税率独立于非竞争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在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时,经济呈现出稳态恒定增速(Glomm & Ravikumar,1994)。Gemmell等(2014)利用OECD国家的年度面板数据对宏观平均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消费以及资本的平均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太显著,但平均劳动税率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则显著。鉴于减税的政府收入效应和财政赤字效应,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较复杂。如果税基不变,降低税率会减少政府税收收入;但降低税率又会增加经济产出,进而可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刘蓉等,2016)。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原因是公共服务支出政策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和储蓄,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最终会对经济体产出和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一定的冲击。由于外部性的普遍存在,李东松等(2018)将政府公共生产性投资对企业生产的外部性和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对消费者的外部性同时纳入研究范畴,进行数理推导与模拟分析,结果发现,在闲暇弹性恒定时,个人所得税率和资本税率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政府生产性公共投资-税收比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而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税收比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几乎没有影响;在闲暇弹性可变时,税率和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关于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少文献是基于公共服务的拥挤性展开研究的,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其对居民影响方式的不

同存在差别(Barro,1992)。譬如,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排他性,则在消费人数过多时会产生拥挤效应(罗伯特·巴罗等,2013)。迟福林(2005)认为,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既是其干预经济的本质所在,也为一个国家提高经济竞争力提供了制度保障。因而,有效的公共服务有助于提升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力。而金成晓等(2014)则在公共支出拥挤性函数(Eicher & Turnovsky,2000)与公共服务生产性函数(Turnovsky & Pintea,2006)的基础上研究了相关拥挤性与规模拥挤性对长期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两者均与长期经济增长率负相关,且前者与均衡增长路径上主要人均经济变量正相关,同时削弱了财政支出政策的扩张效应;而后者则与均衡增长路径上主要人均经济变量负相关,同时对财政支出政策影响较大。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力度也存在区域性差异,相比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支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效果显著(陈丽娴等,2017)。陈丽娴等认为,这种差异是由公共服务支出递增的规模效应所引起,公共服务支出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从而起到提高经济增速的作用,因而提倡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优化政府转移支付。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既有研究把政府转移支付等公共服务支出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与各种税率融入同一研究框架的文献较少,而同时将体现消费者异质性的消费偏好纳入研究范畴的则更少。本文则在综合考虑政府转移支付等公共服务支出对消费所产生外部性影响的基础上,利用标准新古典理论框架,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基于不同的消费偏好规定,分别从理论上考察税率与公共服务支出政策变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随即,基于原有文献的参数取值以及中国宏观变量-产出比率数据,模拟分析产出与税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理论推导与数值模拟分析结果,得出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实现

共同富裕的理论构想是,首先,要注重效率,允许一部分条件便利的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其次,注重公平,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着力帮助、带动发展落后的地区,从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关于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的解决方案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实施。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通过健全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政策调节再分配机制。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关于补短板,要多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脱贫攻坚要务必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既涉及到生产的质量和效率方面,也涉及到分配的公平问题。因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扩大有效供给,注重再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对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至关重要。

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是降成本,而不是降低工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和价值增值的过程,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分为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和用于雇佣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明显缓和,原因是生产资料归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所共有。因此,通过抑制、甚至压低劳动者工资的途径来降成本,将于事无补,甚至适得其反,而减税等措施乃是降低企业成本的根本途径。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进行了重点讨论,公平与效率的权衡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收入差距扩大使得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收入分配中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更是惹人注目。补短板的经济任务与社会公平问题密不可分。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尤其注意补齐以下方面的短板,即经济健康发展、民生福祉建设、生态环境资源等方面的短板。

由此可见,我国所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理念有别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供给学派所奉行之政策主张。为使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摆脱“滞涨”局面,西方供给学派竭力主张大幅度减税,降低边际税率,其理由是,减税能够激励人们多工作、增加储蓄,也能刺激企业投资,进而大力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抑制通货膨胀;此外,他们主张大量削减社会支出,停办不必要的社会保险和福利计划,降低津贴和补助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其理由是,不论是公共投资抑或是转移支付等公共服务支出,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生产,即使有些对经济有益,但效率很低。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切实贯彻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发展理念,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综上所述,推进“一降一补”是现阶段我国的主要任务。虽然短期内减税降费以及增加转移支付等公共服务支出都会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但若着眼于长期经济发展,减税则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削减企业生产成本,进而增加居民储蓄和消费支出,刺激企业投资,进而加快经济增长,提高产出;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会对消费者的福利产生外部性影响。因而,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力度也会对居民的消费计划、进而对经济产出产生一定的冲击。那么,在此宏观经济环境下,政府所实施的减税以及公共服务支出财政举措究竟会对经济产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基于此问题,本文着重研究税率、公共服务支出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三、模型的构建

借鉴 Hiraga & Nutahara (2016) 的设计,本文将资本存量、投资支出、政府债务以及净出口均引入该模型。在离散状态下构建该模型, $t=0, 1, \dots, \infty$, 代表性家庭旨在约束条件下实现一生贴现效用的最大化,其最优规划如下

$$\max_{c_t, n_t, k_t, x_t, b_t} E_0 \sum_{t=0}^{\infty} \beta^t u(c_t, g_t, n_t) \quad (1)$$

$$\begin{aligned} s.t. \quad & (1 + \tau_t^c) c_t + x_t + b_t = \\ & (1 - \tau_t^n) w_t n_t + (1 - \tau_t^k) (d_t - \delta) k_{t-1} + \delta k_{t-1} + \\ & R_t^b b_{t-1} + s_t + \Pi_t + m_t (k_t = (1 - \delta) k_{t-1} + x_t) \end{aligned} \quad (2)$$

公式(1)为目标效用函数,公式(2)是代表性家庭的约束条件。公式(1)具体采取独立可加与非独立可加两种形式,分别如下

$$u^{AS}(c_t, g_t, n_t) = \frac{c_t^{1-\alpha} g_t^\gamma - 1}{1-\alpha} - \kappa B_t^{1-\eta} \frac{n_t^{1+\varphi}}{1+\varphi} \quad (1-\alpha+\gamma=1-\eta) \quad (3)$$

$$u^{NS}(c_t, g_t, n_t) = \frac{1}{1-\alpha} \left\{ c_t^{1-\alpha} g_t^\gamma \left[1 - \kappa (1-\eta) n_t^{1+\varphi} \right]^\eta - 1 \right\} \quad (4)$$

公式(3)为可加效用函数,公式(4)为非可加效用函数。上述公式中各符号含义如下, $c_t, g_t, n_t, k_t, x_t, b_t, A_t, m_t$ 分别代表期消费、政府支出、劳动时间、资本存量、企业投资、政府债券、生产的外生技术水平以及来自国外的转移支付,其中,来自国外的转移支付是外生变量,可以解释为净出口。户主获得来自企业的工资为 w_t ,资产收益为 d_t ,利润为 Π_t ,获得来自政府的利息收入 R_t^b 和定量转移支付 s_t ,不得不支付的消费税率为 τ_t^c ,劳动收入税率为 τ_t^n ,资本收益税率为 τ_t^k 。 $\alpha, \gamma, \eta, \varphi, \kappa, \delta$ 均是常量 $1-\alpha, \gamma$ 分别表示效用函数中私人消费和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 $\eta=\alpha-\gamma$ 则表明私人消费和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是负相关的, φ 表示弗里斯劳动供给弹性倒数, κ 则是表示工资率与劳动之间某种比例关系的常数, δ 表示资本折旧率。

企业的优化问题如下

$$\pi = \max_{k_{t-1}, n_t} y_t - d_t k_{t-1} - w_t n_t \quad (5)$$

$$s.t. \quad y_t = A_t k_{t-1}^\theta n_t^{1-\theta} \quad A_t = A_0 e^{at} \quad (a > 0) \quad (6)$$

公式(5)表示企业所要实现的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公式(6)表示企业所受约束条件,体现了企业生产技术为新古典函数形式。其中, θ, α 分别表示生产中资本所占份额和外生技术进步速度。

政府的预算约束条件与政府的税收收入分别如下

$$g_t + s_t + R_t^b b_{t-1} = b_t + T_t \quad (7)$$

$$T_t = \tau_t^c c_t + \tau_t^n w_t n_t + \tau_t^k (d_t - \delta) k_{t-1} \quad (8)$$

公式(7)表示政府所受约束条件,即政府支出于收入。公式(8)表示政府税收收入由消费税、劳动所得税以及资本收益税构成。

四、税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份额变化对产出影响的数值模拟分析

关于税率、公共服务支出份额与产出关系的数值模拟分析。首先,根据现有文献及中国经济宏观数据确定各参数值及中国宏观变量-产出比率。其次,一方面研究税率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即考察稳态情况下,其他条件不变,仅消费税率、劳动税率或资本收益税率变化对产出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公共服务支出份额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即考察在消费税率、劳动税率以及资本税率保持稳态水平时,政府转移支付等公共服务支出份额的变化对产出的影响。^①

(一)关于偏好参数的假定

关于偏好参数 α 与 η 的取值问题,本文设定 α 的值在0到1之间,其值大于0是因为该效用函数是由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修正而来,其值小于1是为确保稳态一般均衡的存在。对 η 而言,尽管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假定它不小于1,但是Mulligan(2002),Vissing-Jørgensen和Attanasio(2003),Bansal和Yaron(2004),以及Gruber(2013)的实证分析结果证明,效用函数中消费的不变替代弹性大于1,即 η 小于1。Kobayashi, Nakajima和Inaba(2012)证明,消费的不变替代弹性大于1,在 η 为1/2的条件下资产价格对未来生产率冲击的反应是正确的。Christiano、Trabandt和Walentin(2010)的研究认为不变劳动替代弹性倒数 φ 的取值应根据弗里斯劳动替代弹性而定,但其不应该局限于此,尽管其值的确定依赖于对微观数据分析的估量。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弗里斯不变替代弹性非常小。然而,Hansen(1985)和Rogerson(1988)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即使个人的劳动供给弹性是0,总劳动供给对真实工资的变化依然敏感。Christiano, Trabandt和Walentin(2010)利用贝叶斯脉冲反应估计美国经济的参数值时发现 φ 大约等于0.1。Trabandt和Uhlig(2011)则将确定为2,将 φ 确定为1,随后该取值被作为基准值采用,Nutahara(2015)则在其基础上扩大了取值空间,同时考虑了 φ 为1, η 为3,以及Cobb-Douglas效用函数形式。经改进的拉弗模型则同时考虑了 η 为0.5, φ 为0.1,以及 η 为2, φ 为1两种情况,对其模型进

行实证分析和比较。本文虽然修正了效用函数的基本形式,但仍然认为前人对偏好参数值的设定有参考价值。

(二) 以中国宏观变量-产出比率数据为基准值的数值模拟分析

关于生产函数参数以及有关宏观经济数据的比率等取值问题,本文设定具体如下:生产函数中劳动所占的份额的取值以 Bai(2006)对中国经济的估算为准,劳动所占份额约 0.52,故 θ 取 0.48,资本的折旧率则以张军(2004)对各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估算为基准, δ 恒定为 0.083;稳态情况下,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与产出比的取值则以最近 10 年中国公共服务支出占总产出的比

值计算而来, g/y 为 0.083,国外转移支付与产出比的取值以最近 10 年中国净出口与占总产出的比值为基准进行估算, m/y 为 0.037;均衡路径上各项指标增速参数以相关文献普遍采用的国际通用参数值为准, e^a 为 1.02;稳态真实利率根据最近 10 年中国年均利率计算而来, R 为 1.04,稳态劳动供给则以林细细和龚六堂(2007)的对中国样本经济中个体劳动时间占总的时间禀赋的比例为基准, n 为 0.24,稳态资本收入税率为 0.36,稳态劳动收入所得税率为 0.1 以及稳态消费税率为 0.12 的取值依据源于郭庆旺和吕冰洋(2010)对中国税率的综合估量。

在参数 $\varphi=0.1, \eta=0.5$ 时,对比效用函数可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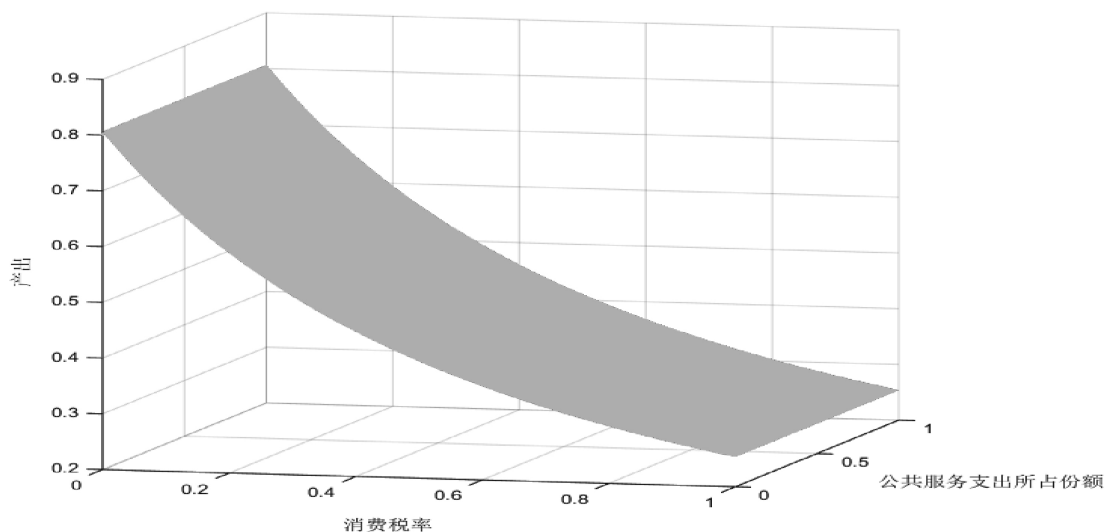


图 1 在效用函数可加情况下产出与消费税率、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关系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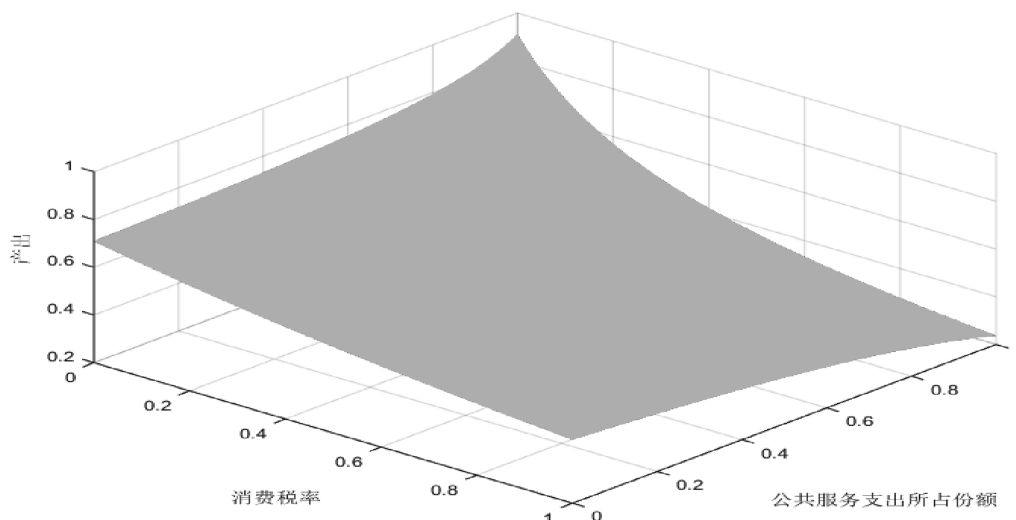


图 2 在效用函数非可加情况下产出与消费税率、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关系 1

与效用函数非可加两种情况下产出与消费税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的关系图1、图2可知^②,在效用函数可加情况下,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效用函数中所占的份额无关,而与消费税率负相关,且随着消费税率的减小,产出的增速越来越大。在效用函数非可加情况下,产出与消费税率负相关,即产出随着消费税率的减小而增大。但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效用函数中所占的份额关系较为复杂,在消费税率较高且恒定时,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效用函数中所占的份额负相关,即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越大,则产出越低;在消费税率较低且恒定时,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效用函数中所占份额正相关,即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越大,则产出越高。(代表性消费税率与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的组合对应的产出值如表1所示)

表1 参数 $\varphi=0.1$ 、 $\eta=0.5$ 时消费税率与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组合对应的产出值

税率、参数	$\tau=0$		$\tau=1$	
	$\gamma=0$	$\gamma=1$	$\gamma=0$	$\gamma=1$
y^{AS}	0.8062	0.8062	0.2539	0.2539
y^{NS}	0.7100	0.9110	0.4668	0.2369

当参数 $\varphi=1$ 、 $\eta=2$ 时,在效用函数可加与效用函数非可加两种情况下产出与消费税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的关系(图略)与参数 $\varphi=0.1$ 、 $\eta=0.5$ 时大体相同,差异在于,当参数 $\varphi=1$ 、 $\eta=2$ 时,产出的波动范围较小,当参数 $\varphi=0.1$ 、 $\eta=0.5$ 时,产出波动范围较大;且前者产出的区间包含在后者的区间内,即前者的最大产出低于后者的最大产出,但其最小产出却高于后者的最小产出。

在参数 $\varphi=0.1$ 、 $\eta=0.5$ 时,对比效用函数可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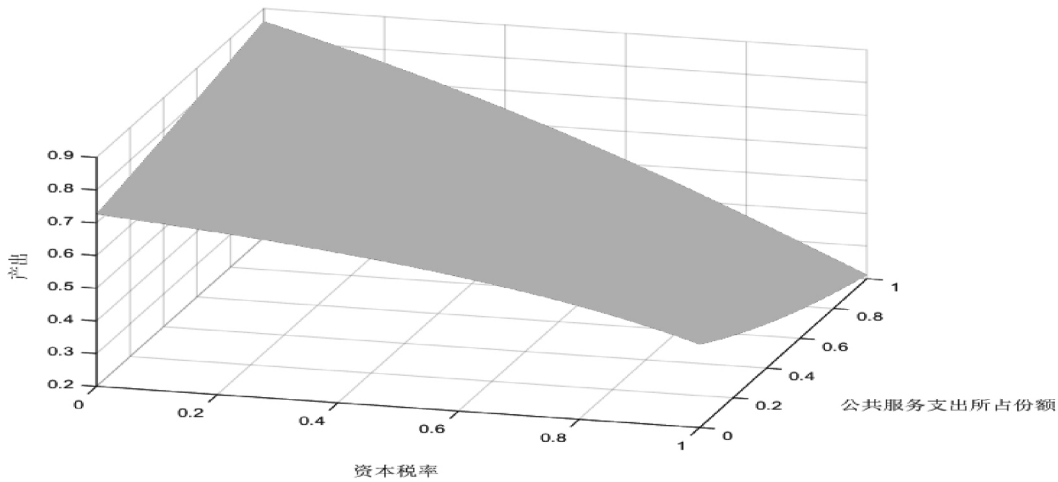


图3 在效用函数可加情况下产出与资本税率、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关系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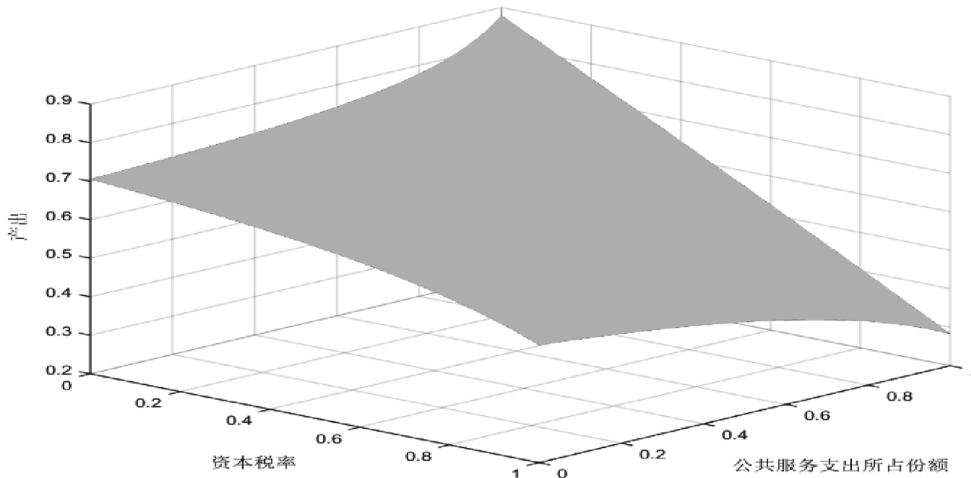


图4 在效用函数非可加情况下产出与资本税率、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关系1

与效用函数非可加两种情况下产出与资本税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的关系图 3、图 4 可知,如果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保持恒定,则产出与资本税率负相关,但随着资本税率的减小,产出的增速越来越小;而如果资本税率较小且保持恒定,则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正相关,但在资本税率较大且保持恒定的情况下,则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负相关。(代表性资本税率与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的组合对应的产出值如表 2 所示)

表 2 参数 $\varphi=0.1$ 、 $\eta=0.5$ 时资本税率与公共服务支出份额组合对应的产出值

税率、参数 产出	$\tau^l=0$		$\tau^l=1$	
	$\gamma=0$	$\gamma=1$	$\gamma=0$	$\gamma=1$
y^{AS}	0.7623	0.8600	0.4552	0.2117
y^{NS}	0.7055	0.8785	0.5055	0.2823

当参数 $\varphi=1$ 、 $\eta=2$ 时,在效用函数可加与效用函数非可加两种情况下产出与资本税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的关系(图略)与参数 $\varphi=0.1$ 、 $\eta=0.5$ 时大体相同。差异在于,当参数 $\varphi=1$ 、 $\eta=2$ 时,产出的波动范围较小;当参数 $\varphi=0.1$ 、 $\eta=0.5$ 时,产出波动范围较大;且前者产出的区间包含在后者的区间内,即前者的最大产出低于后者的最大产出,但其最小产出却高于后者的最小产出。

关于产出与劳动税率、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之间的关系,同样可以通过上述数值模拟分析方法来展示(图表省略)。在参数 $\varphi=0.1$ 、 $\eta=0.5$ 时,在效用函数可加情况下,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效用函数中所占的份额无关,而与劳动税率负相关,且随着劳动税率的减小,产出的增速越来越大;在效用函数非可加情况下,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恒定时,产出与劳动税率负相关,即产出随着劳动税率的减小而增大,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较小时,产出随着劳动税率的减小增长的速度较快,而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较大时,随着劳动税率的减小,产出增长的速度较慢。

当参数 $\varphi=1$ 、 $\eta=2$ 时,在效用函数可加情况下,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效用函数中所占的份额无关,而与劳动税率负相关,但随着劳动税率的减小,产出的增速越来越小;在效用函数非可加情况下,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保持恒定,则产

出与劳动税率的关系与效用函数可加情况下相同,但随着劳动税率的减小,产出的增速更小;税率较小时,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负相关。

由以上不同效用偏好下产出与各税率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份额关系的数值模拟分析可知,偏好类别与参数的选择对产出与各税率(资本收益率、消费税率以及劳动所得税率)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但偏好类别或参数的选择对产出与公共服务支出份额之间关系的影响却较为复杂。其原因可能是,税率的降低,虽然对产出的影响大小各异,但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释放了生产要素的活力,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提高了产出;而偏好类别或参数的不同可能会改变消费的需求结构、劳动的投入量,从而对资本积累进而对产出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将税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纳入统一的理论研究框架,采用效用可加与效用非可加两种效用偏好、同时分别使用两套效用偏好参数,从税率(消费税率、劳动税率和资本税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两方面分析政府财政政策的变化对稳态经济产生的影响,依据理论推导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产出与各税率均负相关。第二,消费税率与劳动税率恒定时,在资本税率较低时,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份额正相关,而在资本税率较高时,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份额负相关。第三,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份额之间的关系也会因消费偏好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譬如,在效用函数可加情况下,保持其它条件不变,仅有消费税率或劳动税率变化,则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份额不相关;而在效用函数非可加情况下,保持其它条件恒定,如果仅有消费税率变化,则在税率较低时,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正相关,在税率较高时,情况则相反;如果仅有劳动税率变化,则在税率较低时,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负相关,税率较高时则无影响。

综上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首先,要切实贯彻、循序渐进执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逐步释放减税政策对不同要素的激励效应,激发企业的生产

活力,提升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消费动力,扩大内需,从而提高产出。税收政策要本着效率、公平以及科学等原则综合考量,在提升居民收入、企业收益的同时,增进人们的福利。就消费税率而言,可降低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税率,以扩大供给,增加消费的数量,提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关于资本收益税率,应切实给予急需发展行业的投资(譬如培育新动能、发展新业态方面)以精准的税收优惠。在劳动所得税率方面,则可以给予科技创新人才因发明创造、理论发现等科技成果所得以税收减免等措施。

其次,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对产出的影响,不仅与税种有关,而且也可能与居民的消费偏好有关。所以,考察政府公共服务支出“补短板”的产出效应要综合税种与居民偏好等因素。譬如,其一,在降低资本税率的同时,扩大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居民消费中所占的份额,激励企业扩大投资规模,增加产出;通过扩大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居民消费中的份额,拉动内需,增强提高产出的动力。其二,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不但能从物质消费中获得效用,也能从休闲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如果消费与休闲所带来的效用具有可加性,那么通过降低消费税率、劳动所得税率,且同时扩大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份额,则不仅能有效提高产出,而且能够发挥财政支出的再分配功能;而在消费与休闲所产生的效用不具可加性时,执行较低的消费税率且提高公共服务支出的份额则可以提高产出,增进人民福祉。譬如,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实现公共财政服务的均等化、普惠性,尽快在补齐民生短板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促进经济增长。

注释:

①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没有提供模型最优化问题的具体推导过程,如果有需求,请向笔者索取。

②图1、图2以及以下各三维模拟分析图形均系以理论推导为据、进而利用MATLAB所绘制。

参考文献:

- 刘蓉、祖进元、王雯:《供给学派理论对当前我国减税政策的启迪》,《税务研究》2016年第2期。
- 李东松、赵志君:《税率、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

3. 罗伯特·巴罗、夏威尔·萨拉-伊-马丁著,夏俊译:《经济增长》,格致出版社2013版。

4. 迟福林:《门槛:政府转型与改革攻坚》,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5. 金成晓、张东敏:《公共服务拥挤性、财政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商业研究》2014年第11期。

6. 陈丽娴、魏作磊:《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与管理》2017年第3期。

7.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8. 林细细、龚六堂:《中国债务的福利损失分析》,《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9. 郭庆旺、吕冰洋:《中国税收负担的综合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12期。

10. 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11. King R G., Rebelo S., "Public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Developing Neoclassical Implications" [J]. *Rcer Working Papers*, 1990, 98(5).

12. Glomm G., Ravikumar B., "Public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in a Simple Growth Model" [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94, 18(6).

13. Gemmell N., Kneller R., Sanz I., "The Growth Effects of Tax Rate in the OECD"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2014, 47(4).

14. Barro R J., "Public Finance in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2, 59(4).

15. Eicher T., Turnovsky S J., "Scale, Congestion and Growth" [J]. *Economica*, 2000, 67(267).

16. Turnovsky S J., Pinteá M., "Public and Private Production in a Two-Sector Economy"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6, 28(2).

17. Hiraga K., Nutahara K., "When Is the Laffer Curve for Consumption Tax Hump-Shaped?" [R]. The Canon Institute for Global Studies, 2016.

18. Mulligan C B., "Capital, Interest, and Aggregate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J]. *Nber Working Paper*, 2002, 97(2).

19. Vissing-Jørgensen A., Attanasio O P., "Stock-Market Participation,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and Risk-Avers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2).

20. Bansal R., Yaron A., "Risks for the Long Run: A Potential Resolution of Asset Pricing Puzzle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4, 59(4).

21. Gruber J., "A Tax-Based Estimate of the Elasticity of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Finance*, 2013, 3(1).

(下转第30页)

大规模行动的需求就会迅速下降,甚至不再有这样的需求。这样一来,合作政治也就会反映出行动体的规模以及开展行动的合作性质。这样一来,任何竞争政治的经验在这里都没有发挥作用的场所和机会了。

就人类思想史来看,伟大的思想并不来源于那些科学研究或学术活动的竞争者那里,而是那些独立于竞争系统之外、弃绝名利的人的创造物。虽然那些竞争者在竞争机制的驱动下也生产出了大量貌似有思想的作品,但距离“伟大”范畴的地标,总会有着较为遥远的距离。所以,我们不认为竞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性动力,更不是唯一性的动力。我们认为,竞争只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所开启的人类历史的新的阶段中,竞争不仅不会成为历史进步的动力,反而会成为破坏性的因素。其实,即使在工业社会中,竞争的价值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中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以家庭为核心的日常生活领域中,竞争是有害的;在基础性的科学研究领域中,特别是对于重大的理论创新而言,竞争也无法起到积极的作用。相反,一切能够被纳入到竞争活动中去的科学研究,虽然也可以定义为科学研究,但只能说是平庸的模仿性质的科学研究活动,至多也是诠释性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归入重大理论创新的范畴。所以,关于竞争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作用都需要在具体的分析中作出评估,而不应笼统地对竞争作出无条件的肯定性评价。在我们的世界中,只有那些被宗教尊奉

为最伟大的神才具有超越一切条件的价值。如果不存在着“竞争拜物教”的话,那么,竞争的价值就需要在具体的条件下去加以认识和定义。所以,无论我们对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的竞争政治抱有怎样的感情,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也必须将这种感情放置一边,然后,去积极地参与到合作政治模式的建构中去。

注释:

[美]戴维·奥斯本、彼得·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谭功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美]卡尔·科恩:《论民主》,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美]艾丽斯·M. 杨:《包容与民主》,彭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1、61、62、62、62、74页。

[美]塞拉·本哈比:《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黄相怀、严海兵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①②③[美]汉娜·阿伦特:《政治的应许》,张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163、163页。

④[美]迈克尔·克尔伯格:《超越竞争文化——在相互依存的时代从针锋相对到互利共赢》,成群、雷雨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责任编辑 陈亚飞

(上接第21页)

22. Kobayashi K., Nakajima T., Inaba M., “Collateral Constraint and News-Driven Cycles”[J]. *Macroeconomic Dynamics*, 2012, 16(5).

23. Christiano L J., Trabandt M., Walentin K., “Dsge Models for Monetary Policy Analysis”[J]. *Handbook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0, 3(16074).

24. Hansen G D., “Indivisible Labor and the Business Cycle”[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5, 16(3).

25. Rogerson R., “Indivisible Labor, Lotteries and Equi-

librium”[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1(1).

26. Trabandt M., Ulig H., “The Laffer Curve Revisited”[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1, 58(4).

27. Nutahara K., “Laffer Curves in Japan”[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15, 36.

28. Bai C E., Hsieh C T., Qian Y., “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6, 2006(2).

责任编辑 郭东杰

ABSTRA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nd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4)

Yang Xiaowei¹, Yang Chunxue²

(1. Law School,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2. School of Economics, CUEB, Beijing 100070)

Abstract: There is apparent difference in their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s due to the lack of exclusive property rights, which leads to overuse of the competitive resource; while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results from the over-segmentation or even fragmentation of the resource per se or its property rights, which makes the exclusive property rights too strong and further results in underuse or even nonuse of the resource.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nd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are symmetrical by mathematical model, while in fields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this conclusion seems controversial—under the two different game situations, the subjects showed different or even opposite social psychology reaction, and the welfare loss caused by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was more serious than that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Key words: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tragedy of the Commons; fairness; efficiency; symmetry

The Impact of Tax Rate and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 on Economic Output

—The Theory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urrent Fiscal Policy (14)

Li Dongsong¹, Zhao Zhijun²

(1. College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 Jiazhuang 050000;
2. Institute of Economic,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Abstract: The “one drop and one supplement” task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of current economic work. The tax rates are considered as the constraint of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given the external influence of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 on consumption, and consumption tax rate, labor tax rate, capital gain tax rate, and the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s such as government transfer payment are included in the unified research framework. Then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tax rates and the shares of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 on the economy. The theoretical derivation is carried out under the assumptions of non-independently and independently additive utility preferences, and the numerical analysis is given based on the Chinese macroeconomic variable-output ratio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Output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tax rat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put and the share of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 in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is different due to different taxes and utility preference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preference; tax rate;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 outpu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mpetition-Politics to Cooperation-Politics (22)

Zhang Kangzh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According to Marxism, there has been politics since class and class struggle came into the division of human society. However, the nature and form of politics are varied in different stages of human history. During historical stage of industry society, the constructed politics is competitive, which is called democracy conventionally. The term “democracy” in political system is in contrast to “aristocracy” in agrari-